

专题|资讯

◀ （上接 7 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黄伯禄在此书序中说明了自己编著此书原为天主教会置买“善举公产”而作,希望借此“永弭衅端”。考虑到晚清时期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前的“民教冲突”多因置产问题导致,黄伯禄此书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黄伯禄为教会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书,转而在汉学界吸引了西方汉学家们的学术兴趣。1882 年时黄伯禄将《契券汇式》翻译成拉丁文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题名为 *De legali dominio practicae notions*。据黄伯禄《中国产权研究》法文序所称,该书流传到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North China Royal Asiatic Society)几位会员的手中,引起后者兴趣,要求刊登于该会会报(见该会报 1888 年 vol. XXIII, 第 118 至 143 页);受此影响,耶稣会上层又请黄伯禄进一步补刊此书,于 1891 年出版;该书风行一时,对在华西人来说极为实用,因而有翻译成法文再版的需要。1897 年收入“汉学丛书”时,由外籍耶稣会士吕承望(J. Bastard)、管宜穆(J. Tobar)分别将拉丁文、中文内容翻译为法文。

黄伯禄的《大清律摘译婚姻门律例注释》一书受到荷兰汉学家施古德(G. Schlegel)的评论。施古德在 1899 年的《通报》上刊文认为黄伯禄此书对于汉学家认识中国法律体系大

有助益,是一部解决了重大法律问题的佳作。他同时也指出黄伯禄该书参考来源以及个别词语的翻译问题。而黄伯禄则回信施古德讨论了具体问题,并在信中表明了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该信刊于 1900 年《通报》上,成为认识黄伯禄与西方汉学家之间学术讨论的历史资料。

黄伯禄“汉学丛书”第 21 号作品《行政杂记》也被称作《中国官制考》,该书是对清朝帝王谱系和官制的系统介绍。在此书出版之前,黄伯禄即著中文《清朝帝系谱》由管宜穆翻译成法文,发表在 1899—1900 年第 33 卷的《皇家亚洲文化北华支会会刊》上,题名为“Tableau Chronologie de la Dynastie Mandchoue –Chinoise Ta-ts’ing 大清”。黄伯禄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为西方汉学界理解满清王朝的起源和晚近中国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提供了基础的准确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1900 年“义和团之乱”期间,著名中国天主教徒英敛之(1867—1926)寓居上海时,与上海天主教界人士中国耶稣会士李问渔(1840—1911)等人交往密切。黄伯禄也在此时为写作《皇朝帝系谱》,亲自询问英敛之“满洲字句”和“国朝官制”。英敛之是满族人,又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自然对满清有更为清楚的了解。以往学者多注意黄伯禄等中国天主教徒“汉学”研究成果对西方汉学家的影响,而少注意

他们研究著作的形成过程。黄伯禄与英敛之的学术交往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片段。

黄伯禄的“汉学”研究著作除关注中国社会各项制度外,也包含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如他后期有关中国地震、中西日历、日月蚀的作品。有学者将之划分为“汉学”研究的工具书。此类主题的作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伯禄作为传统学者型中国神父知识结构的多样化。他的《中国地震考》一书于 1913 年出版第二版,1914 获得“儒莲奖”。

黄伯禄的《中西日历合璧》如《置产契据式》一样早由天主教在徐家汇的印书馆出版 1885 年拉丁文版本和英文本(*A Notice of the Chinese Calendar and a Concordance with the European Calendar*),并在 1904 年再版。此书鉴于中西历法的不同,因而有让中国人和欧洲人互相熟悉对方历算的目的。此外,天主教会出版此书也有传教的目的,以更好地帮助传教士和本地基督徒换算日历,举行宗教仪式。

有意思的是,1904 年版的《中西日历合璧》(海门黄伯禄斐默甫辑译,光绪甲辰中秋沪西徐汇书坊重印)将月历一直换算到了“大清癸卯”(也即 2023 年)。考虑到此书的出版时间,如此换算或也有祝大清朝“福祚绵长”之意。《中西日历合璧》系统地介绍了“天干地支”纪年法,也是近代西人了解中国天文历法的一本小书。

黄伯禄“汉学”研究的影响

耶稣会有其久远的“汉学”研究传统,许多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也以“汉学家”的身份著名于世。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在“汉学”已经成为专业学科的年代里,也希望延续其本会先贤的传统。但面对“专业汉学家”崛起的强势地位,这些被称作“侨居地汉学家”(关于此术语“Resident Sinology”具体所指,参见王国强的相关研究)的来华耶稣会士似乎有些力不从心。黄伯禄等中国天主教徒,不仅熟悉拉丁语、法语等西方语言,同时较他们同会的外籍传教士更为熟悉中文文献和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

黄伯禄等人的西文著作也被称为“汉学”研究成果。他们借由耶稣会的“汉学”研究活动,在西方汉学史上获得了“汉学家”的身份。一般意义上所指的“汉学”乃专谓:一切非中国人而为的关于中国的学术性研究。黄伯禄等中国天主教的“汉学家”身份在此概念下,似乎并不能成立。而他们的“汉学”研究,实际上丰富了我们对于西方“汉学”多样性的认识。

就黄伯禄而言,在他去世后,《泰晤士报》上出现了一篇“讣告”,称其为“东方最博学的人之一”。据笔者推测,此“讣

告”或为英国汉学家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所为。庄延龄向来对黄伯禄的研究成果钦佩有加,也与在江南的耶稣会传教士关系密切。2017 年的一次拍卖会上,出现了黄伯禄与庄延龄的“十八通信札”,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黄伯禄“汉学”著作的影响,以及他与庄延龄之间的学术来往,提供了契机。不过可惜的是,原作为教会档案的这一拍品似并不为外人所能接触。

根据拍卖网站提供的相关图片,庄延龄向黄伯禄请教的问题多与中国政治、法律史有关,如所问“枢垣系内阁系都察院”、“载泽系何人之子”等等。庄氏还请黄伯禄代为购买光绪朝《东华录》一部。庄延龄十分佩服黄伯禄的学识,在一张签写日期为“34 三月初十日到”(“34”应为光绪三十四年,也即 1908 年)的信封上,庄延龄敬称黄伯禄为“黄夫子启”。可见,庄延龄与黄伯禄的通信往来密切,一直到黄去世前还在保持联系,讨论学术问题。如前所述,笔者难以接触这批书信,因而目前对他们之间学术来往的讨论也只能“浅尝辄止”,有待继续。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号 12&ZD128]课题组子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写作另参考李天纲、高继宗、王国强、王皓等学者的研究论文,不再一一列出,谨此致谢)



◀ （上接 7 版）

种是最高贵和文明的。这一理论在 20 世纪中叶就被强烈抨击并且定义为伪科学。然而,仅仅将种族主义归咎于现代科学是不正确的。历史证明,世界很多古文明中都实施过奴隶制度,并且被“合理化”为上帝的设计。古希腊人和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关于非洲人种是劣等种族的描绘会使人们看得心惊胆战,而西塞罗对不列颠人的看法也不那么仁慈。

需要指出的是,希特勒并不认同达尔文的演化论。种族论者认为,不同种族的人来自不同的物种,适应于不同的且具有优劣之分的文明,一旦他们融合了,他们就会退化。而达尔文认为人类都是从猿演化而来,拥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野蛮”起源,所有种族的能力都是相同的,而且种族之间的融合并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平克说道,这些复杂的行为需要人们更为系统、深入的理解,而不仅仅是像很多人文学者

避重就轻地抨击科学。对达尔文演化论的误解促进了“科学种族主义”的发展,但它更主要的是那个时代历史、哲学、文化、宗教、政治等人文学科作用下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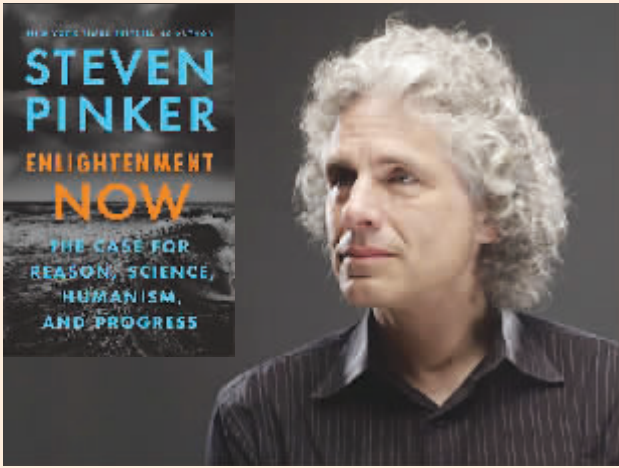
过分的生物伦理审查已开始阻碍科学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可说是人文与科学之战的巅峰,到当今这个时代,高等学府中对科学的谴责并没有消失。例如说建筑工程师造了博物馆同时也造了毒气室,古典音乐既促进了经济活动又激发了纳粹暴行。

平克认为,对于科学的妖魔化会影响科学本身的发展。现在所有和人打交道的研究,即便是一次访问,一份问卷调查,科学家们都需向委员会证明他们不是纳粹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确实,研究对象需要受到保护,然而现在审查机构的一些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一

使命。有些过分的审查已经开始阻碍科学发展。医学研究者、新药开发者乔纳森·莫斯(Jonathan Moss)曾在竞选芝加哥大学研究评估委员会主席时说道:“说到以下三种我们人类受益匪浅的医学奇迹,放射线检查、心脏导管插入术以及麻醉术,请大家想一下,假设我们想在 2005 年做这些研究,恐怕都会因伦理审查而夭折。”不止这些医学奇迹,像胰岛素、烧伤研究等拯救生命的发现发明恐怕都会遭到胎死腹中的命运。

有些生物伦理学家为过分审查正名,即便是在患者知情且同意的基础上,以及这是一项帮助患者且并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坏处的研究,他们也可以找出各种理由阻碍其开展。平克觉得,他们用上“尊严”“神圣性”“社会正义”这些词汇,其实含糊不清,却又很难反驳。他们甚至试图将其与核武器、纳粹暴行,甚至很多科幻作品中的情形联系起来,像是克隆人和器官买卖等。牛津大学哲学教授朱利安·



萨弗莱斯库(Julian Savulescu)谴责了这些观点背后的低水准推理,并且称其是不道德的:“对于一些致命的疾病,你们需要为因为阻碍延迟开展研究而使得患者无法延长生命而负责。”

平克赞扬现代科学的益处,他认为向人们传递科学的益处是非常重要的,最大的好处是使得人们能够学会科学地思考问题。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容易受到偏见和谬误影响。有些政治家和新闻学者就缺少定量研究

等的科学思维,他们总是依赖类似于轶事、头版头条、修辞隐喻以及被工程师称作高薪人士意见(HiPPO:highest-paid person’s opinion)的方法发表对于重大问题,甚至是生命攸关的事件的看法。统计学方法的缺失会导致危险的偏见。比如他们认为现在犯罪甚至战争越来越多,然而事实是数量正在减少;他们认为恐怖主义是威胁人类肢体和生命

（下转 9 版） ➡